

《墨子》三大传本系统

郑 杰 文

一

《墨子》书,西汉成帝年间,刘向曾予整理;而任宏领校兵书,亦曾涉乎《墨子》。故刘歆作成《七略》,将前者著录在《诸子略》,后者著录在《兵书略》。班固承《七略》而为《艺文志》,在《兵书略》“兵技巧”类谓“省《墨子》重”,而在《诸子略》“墨家”著录“《墨子》七十一篇”,注曰“名翟,为宋大夫,在孔子后”^①。

东汉时,《墨子》篇数有变化。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当染》云“墨子名翟,鲁人,作书七十二篇”,却又于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》注云“墨子名翟,鲁人也,著书七十篇,以墨道闻也”^②。其云“七十二篇”者,当有班固之后的人所编目录一卷在内,故萧梁庾仲容《子钞》载《墨子》为“十六卷”,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明确著录为“《墨子》十五卷,目一卷”;高诱云“七十篇”者,当指其约数,此一情况古代不乏其例,如孔门弟子之数,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“七十有七人”,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云“七十子”^③。王应麟不知此约数之称,故于《玉海》中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“自《亲士》至《杂守》为六十一篇”下注曰“亡九篇”^④;蒋维乔又据此云“《墨子》共仅七十篇……七十一篇者,已有目在内,自成一卷”^⑤。殊不知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某书篇数时多不含目录。如其著录“《孟子》十一篇”,

与赵岐《孟子题辞》言孟子“著书七篇”“又有外书四篇”之篇数相合,是篇数中无目录;又如其著录“《鲁论语》二十篇”,《鲁论语》经张禹、郑玄、何晏整理而传至今,知此“二十篇”指正文篇数,故班固于《古论语》“二十一篇”下注“两《子张》”、于《齐论语》“二十二篇”下注“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”,是其篇数中亦不含目录。

其后,抄录《墨子》者自竹简而至缣帛,故合篇为卷。萧梁庾仲容辑钞《子钞》时《墨子》已为“十六卷”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因之著录为“《墨子》十五卷,目一卷”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、王应麟《玉海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均著录“《墨子》十五卷”,而“目一卷”缺载;但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为“《墨子》三卷”;王应麟《玉海》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既载“《墨子》十五卷,自《亲士》至《杂守》六十一篇”,又载“一本自《亲士》至《尚同》凡十三篇”;焦竑《国史经籍考》著录“《墨子》十五卷,又三卷”^⑥。

于是,《墨子》流传中便出现了“三卷本”与“十五卷本”两个系统。

二

“《墨子》三卷本”,疑出自隋人乐壹。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于:“《墨子》,又三卷”下谓“乐臺^⑦注,《唐志》不载,当考。”宋濂《诸子辩》云:“《墨子》三卷,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。上卷《亲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、《法仪》、《七患》、《辞过》、《三辩》七篇号曰经,中卷《尚贤》三篇、下卷《尚同》三篇,皆号曰论,共十三篇。”^⑧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引此后曰:“予藏宏治^⑨己未旧抄本,卷篇之数恰与其言合。……潜溪博览典籍,其辩订不肯聊且命笔,而止题为三卷,其犹未见完本欤?”^⑩由此可知王应麟《玉海》所引

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之“十三篇”本即焦竑《国史经籍考》之“三卷本”，钱曾犹及见三卷十三篇之“宏（弘）治己未旧抄本”。元人陶宗仪《说郛》中《墨子》著录篇目为“《亲士》第一、《修身》第二、《所染》第三、《法仪》第四、《七患》第五、《辞过》第六、《三辩》第七、《尚贤上》第八、《尚贤中》第九、《尚贤下》第十、《尚同上》第十一、《尚同中》第十二、《尚同下》第十三”，即此“三卷十三篇本”。

又，今《道藏》本《墨子》“十五卷本”系统自《亲士》至《三辩》恰好七篇，自《尚贤上》至《尚同下》恰好六篇，合《中兴馆阁书目》“十三篇”本所列起止篇名。那么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载之“十三篇”本、焦竑《国史经籍考》所载之“三卷本”、钱曾犹及见三卷十三篇之“宏（弘）治己未旧抄本”系统，实乃“《墨子》十五卷”本之节本，缺第四卷《兼爱上》、《兼爱中》、《兼爱下》及其以下十二卷五十八篇。此一传本因系节本，流传价值不大，故自“道藏本”《墨子》五十三篇流传后，《墨子》三卷十三篇本流传渐少，只有《说郛》（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）等少数丛书收录此本。

三

“《墨子》十五卷本”，当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著录“《墨子》十五卷，目一卷”之阙“目一卷”者，第十六卷当为《目录》。此十五卷篇目，毕沅《墨子注》曾参照《道藏》篇卷^①为之重排目录为：第一卷7篇：《亲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、《法仪》、《七患》、《辞过》、《三辩》；第二卷3篇：《尚贤上》、《尚贤中》、《尚贤下》；第三卷3篇《尚同上》、《尚同中》、《尚同下》；第四卷3篇：《兼爱上》、《兼爱中》、《兼爱下》；第五卷3篇：《非攻上》、《非攻中》、《非攻下》；第六卷6篇：《节用上》、《节用中》、《节用下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节葬上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节葬中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节葬下》；第七

卷3篇：《天志上》、《天志中》、《天志下》；第八卷4篇：《明鬼上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明鬼中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明鬼下》、《非乐上》；第九卷7篇：《非乐中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非乐下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非命上》、《非命中》、《非命下》、《非儒上》（有目无文）、《非儒下》；第十卷4篇：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；第十一卷3篇：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、《耕柱》；第十二卷2篇：《贵义》、《公孟》；第十三卷3篇：《鲁问》、《公输》，题目及正文皆缺一篇；第十四卷12篇：《备城门》、《备高临》，题目及正文皆缺二篇，《备梯》，题目及正文皆缺一篇，《备水》，题目及正文皆缺二篇，《备突》、《备穴》、《备蛾傅》；第十五卷8篇：题目及正文皆缺四篇，《迎敌祠》、《旗帜》、《号令》、《杂守》。但明人吴宽所见本之篇目次序与此不同：毕沅《墨子注》据“《道藏》本”将《备城门》作“第五十二”，而吴宽抄本将《备城门》作“五十四”，并于正文末手跋云“本书七十一篇，其五十一之五十三、五十七、五十九之六十、六十四之六十七，篇目并阙”^⑫。两本之篇目顺序差异在于：毕沅所据“《道藏》本”之《备城门》前题目及正文皆缺1篇，《迎敌祠》前题目及正文皆缺4篇；而吴宽所见本《迎敌祠》前题目及正文皆缺2篇，《备城门》前题目及正文皆缺3篇。

毕沅本和吴宽本之题目及正文皆缺者都为10篇。此10篇缺题篇目，除4篇难以揣测外，《备城门》以下所缺6篇之名，据《备城门》篇首墨子与禽滑釐的问答可以推测。《墨子·备城门》载：“禽滑釐问于子墨子曰：‘……吾欲守小国，为之奈何？’子墨子曰：‘何攻之守？’禽滑釐对曰：‘今之世常所以攻者：临、钩、冲、梯、堙、水、穴、突、空洞、蚁傅、辘轳、轩车。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？’”^⑬依此，《备高临》以下所缺2篇当为《备钩》、《备冲》，《备梯》以下所缺当为《备堙》，《备水》以下所缺2篇当为《备空洞》、《备辘轳》，而次序与《备突》等淆乱，^⑭《备蚁傅》今作《备蛾傅》，其以下所缺当为《备轩车》。另外难以推测篇目之4篇，毕沅

本置《备城门》前1篇、《备城门》后3篇,而吴宽本置《备城门》前3篇、《备城门》后1篇。

这10篇缺题篇章脱缺的时间,洪颐煊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论而谓“无题十篇宋本已阙,有题八篇阙文,在宋本已后”。孙诒让以“《道藏》本即从宋本出,有题八篇,宋本盖已阙”,而谓“洪说未塙”^⑮。

“十五卷本”系统之“《道藏》本”为清孙星衍、卢文弨、毕沅所注,成为清中后期广为流传的本子。

四

《墨子》“三卷本”系统和“十五卷本”系统之外,还出现过《墨子》“治术”选本系统,即唐人魏徵《群书治要》之《墨子治要》。其选本出现的原因,《书林清话》卷二曰:“古书无刻本,故一切出于手钞,或节其要以便流观。如《隋志》所载梁庾仲容《子钞》,其书虽佚不传,而唐魏徵《群书治要》、马总《意林》,固其流派也。”^⑯由于抄写困难,故时人抄部头大、卷数多之书时,往往撮其精要,《墨子》因此以选本面貌出现在《群书治要》中。

《群书治要》,唐太宗重臣魏徵奉敕编抄。《群书治要》的编抄,主要为了总结治术,为唐太宗施政提供借鉴。此举于贞观五年(631)完成。该书从经、史、子三部之66种典籍中,摘取与治理有关的前人论述加以编排,共得50卷。该书首见载录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还载有刘伯庄《群书治要音》五卷,说明在唐太宗时期《群书治要》不但在流传,而且有人在研究。但至《宋史·艺文志》,仅载录“《群书治要》十卷”,注云“秘阁所录”,是《群书治要》至此已残缺,且在北宋四大皇家藏书阁中仅秘阁有藏。《书林清话》卷一曰:“唐魏徵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,目录分五函,亦以十卷为一函。”^⑰是原书五函,北宋时仅存一函。其后,《群书治要》皆不见载于官家、私家目录书,可能在两宋之交或宋元之

交，所存之一函十卷也已亡佚，世人已不能窥其踪影了。

好在传入日本之《群书治要》还有残本存世。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年间（834—847），即《群书治要》编定后200余年的唐文宗、武宗时代，《群书治要》已传入日本。其后受到历代日本执政者的重视，故有多种抄本、印本传世。

其印本如：后水尾天皇元和二年（1616）骏河铜活字本、光格天皇天明七年（1787）尾张藩刊本、仁孝天皇弘化三年（1846）纪伊藩据元和本重刊本等。前两种版本于上世纪初复传回中国，《书林余话》卷下曾载神田喜一郎论“元和二年铜活字本”与“尾张藩刊本”之优劣曰：“《四部丛刊》之刊行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。吾辈学生，无不同感此福音。今读其预定书目，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。四部中重要书籍，已网罗俱尽。其选择底本，亦尚为适当。虽然，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，则如此巨构，于底本之选择，尤宜格外注意。如《群书治要》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，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张藩刊本，注意似犹未周。”^⑩谓“元和二年铜活字本”优而“尾张藩刊本”劣。

《群书治要》之日本抄本，现存最古者为镰仓时代龟山天皇文永年间至后宇多天皇建治年间（1264—1277）之北条实时、孙贞显等写本，称“镰仓写本”，今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保管。此写本缺卷四、卷十三、卷二十，存47卷。该写本后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昭和十六年（1941）排印本、日本汲古书院平成元年（1989）影印镰仓写本等。

“镰仓写本”以汉文抄录，部分字旁标有日本假名读音。首载魏徵《群书治要序》，次节抄《周易》等经书、《史记》等史书、《六韬》等子书所载政论章句。而《墨子》在第三十四卷，依次摘录《所染》、《法仪》、《七患》、《尚贤》、《非命》诸篇墨子论述。所抄《墨子》各篇提行，篇目上皆以圆墨丁志之。^⑪

以“《道藏》本”《墨子》校《群书治要》“镰仓写本”之《墨

子》,《群书治要》“镰仓写本”《墨子》之《所染》篇,首句“子墨子”下不衍“言”字,“其色亦变”下无“五人必而已则为五色矣”10字,“故染不可不慎也”之“也”做“邪”,“舜染于许山伯阳”之“许山”作“许由”,“晋文染于舅犯高偃”之“舅犯高偃”作“咎犯”,“楚庄染于叔孙沈尹”之“叔孙沈尹”作“殊孙”,“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”之“伍员文义”作“五员”,“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”之“范蠡大夫种”作“范蠡”,“此五君”下多一“者”字,“功名传于后世”脱“功”字,“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”之“长柳朔王胜”作“张柳朔”,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彊”之“籍秦高彊”作“籍秦”,“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”之“王孙雒太宰嚭”作“宰嚭”,“知伯瑶染于智国张武”之“知伯瑶”作“智伯瑶”、“智国张武”作“智国”,“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”之“魏义偃长”作“魏义”,“宋康染于唐鞅佗不礼”之“宋康”作“宗康”、“唐鞅佗不礼”作“唐鞅”,“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”作“其行理生于染当”,并且无“非独国有染也,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,淳谨畏令,则家日益,身日安,名日荣,处官得其理矣,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,创作比周,则家日损,身日危,名日辱,处官失其理矣,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刀之徒是也。诗曰‘必择所堪,必谨所堪’者,此之谓也”诸句。

两相对比可见,《群书治要》抄录时所本之《墨子》,与《道藏》本《墨子》之“十五卷”本系统,字句差异较大。与隋人乐壹注“三卷本”系统也不同,乐壹注“三卷本”系统止于“《尚同下》第十三”,而《群书治要》抄有其后之《非命》篇文,它们显然也不是同一个传本系统。《群书治要》抄录时所本之《墨子》,是否是唐人杨倞注《荀子》时所见之“《墨子》三十五篇”本,今已难考。杨倞所见本或为唐人删去《墨子》之“墨经”、“城守”等部分后的《墨子》选本,曾在唐代流传,今亦难考其详。

所以说,《群书治要》之选本《墨子》与《道藏》本《墨子》互

有优劣,而《群书治要》抄录时所本之《墨子》虽多有脱文,但如《所染》篇首句“子墨子”下不衍“言”字、“知伯瑶”作“智伯瑤”等,亦多有可取处。

由上可见,汉魏以来,《墨子》书共有三大传本系统在流传。最先流传的是《墨子》十五卷七十一篇本;后有隋人乐壹节注《墨子》前十三篇而为三卷本;其后又出现《墨子》“治术”之选本,今天可见者为唐人魏徵《群书治要》之《墨子治要》本。十五卷七十一篇本传至唐代已出现残缺,后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云正文“自《亲士》至《杂守》为六十一篇”,至明正统间编《道藏》时仅有五十三篇正文,遂流传至今。自“道藏本”《墨子》五十三篇重出后,三卷十三篇本流传渐少,只有《说郛》(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)等少数丛书收录此本。唐人魏徵《群书治要》之《墨子治要》本,自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录后即不见流传,却因传入日本而保存下来,复又传入我国,成为《墨子》选本系统的代表。

注:

- ①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762、1738页。
- ②《吕氏春秋》,《诸子集成》本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86年,第18、162页。
- ③同①,第1662、1701页。
- ④孙诒让:《墨子间诂》,《新编诸子集成》本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601页。
- ⑤陈奇猷:《吕氏春秋校释》,学林出版社,1984年,第97页。
- ⑥同④,第597—603页。
- ⑦疑“乐臺”当“乐壹”之形讹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鬼谷子》有“乐一注”。
- ⑧宋濂:《宋濂全集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137页。
- ⑨“宏治”即“弘治”。
- ⑩钱曾:《读书敏求记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82页。

⑪《道藏》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7册，第228-306页。

⑫同④，第592页。

⑬同④，第450-453页。

⑭孙诒让曰：“疑亦传写移易，非其旧也。”（同④，第506页）

⑮同④，第596页。

⑯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30页。

⑰同⑯，第19页。

⑱同⑯，第43页。

⑲魏徵：《群书治要》，影印宫内厅书陵部藏镰仓写本，汲古书院，1989年，第五卷，第256-281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

（上接第127页）

③二月朔当为“己卯”而非“卯”，“乙”、“己”恐为鱼鲁之误；三日应为“辛巳”而非“壬午”，两者相差一天。

④详见后藤昭雄：《平安朝汉文文献之研究》，[日]吉川弘文馆，1993年。

⑤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》录文，以东大寺图书馆藏宗性手稿本为底本，参考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》本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本。下同。

⑥《东大寺要录》据筒井英俊校录本，[日]全国书房，1944年。

⑦《扶桑略记》据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》本，[日]吉川弘文馆，1965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